

公共设施与城市文化基因传承

夏雅琴 江家慧¹

【摘要】：城市公共设施是城市文化基因的展示媒介，因而以文化基因视角介入公共设施更新设计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上海是城市文化基因解析研究的范例。结合上海城市文化基因的微观解读与设计形态学理论知识阐释，以旧城公共设施更新为代表的公共设施文化性更新的价值与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公共设施的文化性设计统领城市意象，提升城市文化传承力；以旧城公共服务与设施文化性更新助力宜居城市建设，提升市民归属感和幸福感；以公共设施构建城市街道空间子系统的内在文化联系，提升城市文化品牌辨识度。

【关键词】：文化基因 公共设施 城市 文化性更新设计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 (2021) 10-0246-08

从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文化发展大繁荣”到十八大明确“建设文化强国”，再到十九大强调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建设是灵魂”已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1]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保护、传承并发扬城市优秀的历史文化，成为 21 世纪中国城市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化基因是决定文化特色的“内在力量”，也是文化代际传承的基本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采用“基因”“文化基因”和“精神基因”等概念论述我国传统文化。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更是提出，要将“尊重场地的历史文脉精神”与促进城市宜居和谐发展联系起来。

因此，从城市文化传承的视角，充分挖掘、梳理城市文化基因，借助系统设计理论方法构建城市文化基因与城市公共设施尤其是旧城公共设施更新设计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综合规划与设计来恢复、保持和延续城市公共设施的文化性，并以此提升城市软实力建设水平，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一、城市公共设施文化性设计的现状

公共设施是城市空间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作为城市文化发展的有形载体，城市公共设施承载并体现了城市文化基因。西欧国家为恢复城市人文性，保持和延续城市历史和文化，颁布了“伦敦策略指引”“城市更新细则”“大曼彻斯特政策指引”等城市更新策略，来指导公共设施更新升级。我国的城市公共设施文化性设计研究，由于特定历史时期“大拆大建”的影响，存在研究滞缓的问题。理论研究的缺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文化特征弱化，以及由城市公共设施的文化缺失带来的设计同质化和畸形化问题。

城市公共设施是指为城市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各种公共性、服务性设施。^[2]参照过伟敏、史明等人在《城市景观形象的视觉设计》一书中对一般城市公共设施的定义，可以将其分为：信息设施、卫生设施、照明安全设施、娱乐服务设施、交通设施以及艺术景观设施。

¹**作者简介**：夏雅琴，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博士。（上海 200051）

江家慧，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硕士生。（上海 20005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宜居生活圈构建理念下的城市老旧小区公共设计与服务研究——以上海为例”（18YJA76006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随着城市社会功能的不断深化,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然而受“旧城”大拆大建的改造方式的影响,城市建设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忽略了城市文化基因要素,导致“旧城”公共设施设计个性弱化、趋同,甚至出现了一些畸形化的产物。例如:将国宝熊猫与垃圾箱造型简单组合后高频出现在各地的“特色设施”;“地跨南北”却式样雷同的铁盒式公交站台;无视民族情感与在地文化,盲目照搬国外样式的“盛唐·小京都”景观装饰设施等。

目前,由于大型城市老城区的中心存量土地开发成本极高,土地二次开发经济效益低下,各地旧城区公共设施的升级配套长期处于被忽视的边缘状态,部分不合格的公共设施甚至已成为城市居民生活安全的潜在威胁。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与痛点,城区公共设施的升级改造在关注功能实现、管理维护成本、配置数量等实用性问题之外,还应应对陈旧、同质化和恶质化的外观造型进行文化性设计。

国内已有城市开始在政府决策层面认识到城市文化基因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陆续开展了有益的探索。如:上海较早地认识到城市文化基因在辐射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和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先后出台了《上海市“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及《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提出努力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目标。上海还在以旧城街区和社区为基础进行的存量空间小规模改造与整治过程中,重点关注并挖掘上海优秀的文化基因,持续推进上海旧城区域公共设施文化性建设,促进城市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发展。北京在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建设国家历史文化保存传承利用典范地区的过程中,挖掘京味文化,对代表老北京生活精华的胡同展开了一系列城市公共空间改造提升工程。在北京上斜街及金井胡同改造提升项目中,以会馆文化为基因,胡同空间为载体,将城市公共设施文化性设计与居民公共活动行为需求结合,重点提升了7个公共服务节点,从细微处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在传承地域历史文化的同时,打造高品质胡同公共空间体系。江西萍乡素有“赣西文化堡垒”之称,其将红色文化融入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中,借助公共文化设施的传导,将当地红色文化转化为精神驱动力,指导当地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并初步形成了具有萍乡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模式。

二、城市文化基因的内涵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地域文明体。从文化生命体延续的视角来看,一个城市的发展就是城市文化基因传承与肌理构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承载了文化,而文化又赋予城市生机。

(一) 文化基因及其分类

文化基因又称迷米(Meme),是在生物学“基因”内涵基础上提炼出的一种形容文化核心属性的概念。^{[3](P11)}20世纪50年代,英国生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将文化基因定义为“一个文化传播或模仿单位”^{[4](P48)},这也是今天关于“文化基因”表述的主要源头。在柯林斯词典中“文化基因”被解释为:通过非遗传方式(尤指通过模仿)而代代相传的文化观念或社会行为要素。因学科背景、研究视角的不同,对文化基因存在方式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包括模仿复制论、思维方式论、因素因子论、动因动力论和类型实体论等多个基本论断。其中,基于类型学的类型实体论研究路径,可针对城市街道文化基因的具体情况,围绕对象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进而归类与推演出最为接近或贴切的基因组分类和符号提取方法。^[5]因此,以类型学为指导展开公共设施与城市文化基因的传承研究更加可行。

作为研究文化传承、发展及变迁的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文化基因研究也广受中国学者关注。尽管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但理论与实践研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众多专家、学者就文化基因在城乡规划学、建筑学、景观学、设计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展开了广泛讨论。文化基因与设计融合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发展迅猛,在多个城市积累了丰富的应用案例。相关理论研究多由宏观城市规划角度入手,主要关注历史街区的保护更新、旧城更新、区域文化保护等方面。如:钱珏等提出,优秀的文化基因可作为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桥梁,在设计理念中应保持传统与现代双轨并行。^[6]同时,有关文化基因与设计融合的实践则多集中在文化基因的分类、特征提取、表现形式和具体设计应用中。如:姚瑶与胡慧结合独山革命旧址群个案,提取当地红色革命文化基因以支持地域性的导视系统设计。^[7]苟秉宸等明确了文化基因在设计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半坡彩陶文化基因的设计应用实实验

证了文化基因融入产品设计的可行性,为文化基因库在民族文化性产品中的应用提供了参考。^[8]方新等对地域文化基因在产品
设计中的转译与物化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并以徽州地域文化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进行了实践验证。^[9]

（二）城市文化及其基因的历史传承

城市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社会文化空间。受“新城市主义”“城市可持续再生”“城市复兴”等理念为代表的多元化现代城市
设计理论的影响,我国在旧城更新改造方式的选择和策略制定中开始引入文化性建构的内容。在被誉为21世纪指导中国城市
建设重要准则的《北京宪章》中明确提出:“文化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文化是历史的沉淀,不仅存留于城市和建筑之中,也融
汇在人们的生活之中。”^[10]《北京宪章》强调了文化之于城市建设的重要性,指明以城市的文化生产能力和文化生产水平来评价
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这将成为判断城市发展质量优劣的重要指标。

对于城市文化的涵盖范围,现有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说,城市主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的总和都可被称为城市文化。狭义的内涵剔除了广义概念中“物”的成分,城市文化仅涉及精神活动及其产物。本文中的城市文
化是指广义的城市文化,包含了物质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三个层面。

城市文化的积累是城市文化基因不断传递扩散和迁移重组的过程,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世代延续的结果。城市文化基
因,则是指城市文化所表达的城市特有并可被传承的信息,它是一个城市历史与现代文明有机融合的结果,也是城市灵魂的名
片。

城市文化基因的传承需要实体的承载。城市中随处可见的街道景观、建筑造型和城市家具等有形实体,均以直观的视觉形体
向市民展示城市文化肌理。在各种承载实体中,公共设施是矗立于城市街道公共空间中的基础服务设施,其不仅在人们目之所及
处展示城市文化魅力,而且以多样化的功能向城市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它是城市文化基因的天然展示窗口,更是城市文化性建设
中落实居民实际生活需求、落地城市生活圈文化建设目标的良好载体。

三、城市文化基因的分类

在城市快速化的进程中,不少城市的核心区域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地方传统文化丧失、街区风貌趋同、特色文化文脉断裂
等问题。在“建设文化强国”的总体目标指引下,为实现现代化城市文化性建设目标,在城市建设中彰显优秀文化基因,提升城
市内涵品质,实现旧城公共设施与城市文化基因的设计融合,首要工作即是对城市文化基因的分析与解码。在类型实体论的研究
基础上,可重点从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变异基因四个角度对城市文化基因进行梳理,并以文化基因谱系研究中常用
的“物质文化基因”与“非物质文化基因”分类方法进行进一步解析。

与北京、萍乡等传统历史名城、特色文化城市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传承相比,上海在其近代发展历程中,历经了多次外来文
化的输入和嫁接,城市文化基因曾屡次面临“衰颓”“翦灭”的窘境。随着近年“上海文化”品牌打响,城市文脉“基因”被激
活,海派文化、红色文化、江南文化在上海共生共荣。经历文化冲突又在新时代焕发生机的上海,无疑是城市文化基因解析研究
的范例。

（一）主体基因

主体基因作为其他类型文化基因的母体,是文化基因谱系中的核心要素。一旦作为母体的主体基因缺失或消亡,地域文化就
无从谈起,地域特色也便不复存在^[11]。现有研究多以地域主导性原则辨析主体基因。“海派文化”是上海特有的地域文化风格,
它是在传统吴越文化与异质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一种特殊城市文化氛围与城市气质。在“海纳百川、追求
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影响下,海派文化至今仍具有很强的传承性与生命力。因此,可将海派文化作为上海城

市文化的主体基因对其进行物质文化基因和非物质文化基因的提炼。其中，海派文化的物质文化基因具体内涵可包括：以石库门建筑、里弄建筑群和苏州河沿岸景观带等为代表的海派建筑文化；以海派旗袍、西服为代表的海派服饰文化；以上海本帮菜和海派点心小吃共同组成的海派饮食文化；以“西式中做”为主要特征的海派家具文化等。海派文化的非物质文化基因则可借助沪剧、上海派歌舞、海派文学、海派书画等海派民俗文化的语言、文字和艺术媒介来进行展现。

（二）附着基因

附着基因是依附于主体基因而存在并对主体基因起进一步强化作用的文化基因。对于以海派文化为主体基因的上海城市文化基因而言，其城市物质文化附着基因同样具有多种文化符号。其中比较典型的物质文化附着基因有：以石发券门头、拱券、“新海派”密丹公寓的大象形体仿生立面造型为代表的建筑构件；以“迪考艺术”风格的面料纹样、“西洋风格”的铁艺老门花饰为代表的装饰图案等。非物质文化附着基因则以“沪剧”与“沪语”中特有的语音语调和用词习惯、文学类型中鲜明的写作手法和文学题材为代表。具体表现为：细腻流畅的“十八辙”唱调、中英混合的“洋泾浜语”、《海上花列传》中常见的“穿插藏闪”之法、《官官的补品》中人性欲望的主题选择等。可以说，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共生，也是上海“海派”文化的特征之一。^[12]

（三）混合基因

混合基因指两种或两种以上、同地区或不同地区的文化基因融合后形成的文化基因。由于混合基因不为某个地域所特有，因而其在城市文化基因中具有平衡地域特色文化和增加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就上海而言，其城市文化混合基因主要包含了吴越文化与红色文化。

吴越文化亦称“江南文化”，其文化辐射区基本涵盖了上海和苏锡常都市圈。吴越文化因其开放性的特征，成了上海城市文化中较为典型的混合基因。上海城市物质文化混合基因包含有“贴水成街，就水成市”的吴越建筑文化、“饭稻羹鱼”的吴越饮食文化等；上海非物质文化混合基因则包含有吴越民俗文化（民俗技艺中的海盐滚灯）、吴越语言文化（吴越同音共律的吴侬软语）等。

红色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在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物质与精神财富。^[13]中国幅员辽阔，红色文化在不同城市中各具特色。上海红色资源丰富、文化基因厚实，相关物质文化基因包括：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红色历史建筑、上海毛泽东寓所红色旧址、上海红色泥城主题馆、无名英雄纪念馆墓遗址等 612 处红色资源。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上海红色文化地图》地图服务以及红色民间传说故事、红色连环画等构成的非物质文化基因也在近几年被重点挖掘。

（四）变异基因

变异是源自生物遗传学的概念。在异质文化因素的影响下，文化基因会因变异而产生包括良性变异基因和恶性变异基因在内的文化基因。近代上海城市文化良性变异的起因主要是 21 世纪初上海对殖民地历史时期因各国文化聚集、融合而产生的租界建筑群的改造。这些改造在保留原有建筑肌理的基础上融合了当代文化元素，形成了以“新天地”“田子坊”等具有上海新时代特征的文化地标和上海城市文化良性变异基因。而上海城市文化恶性变异基因则源自城市粗放型发展时期上海中心旧城区拔地而起的大量超高层建筑。这类建筑对传统历史文化保护区域形成了侵入性的破坏，产生了“以港兴市”的一系列拆建，以及外滩十六铺被拆除、上海电影工业发祥地之一的虹口大戏院被拆除等争议性事件。

四、城市文化基因与公共设施的内在关系

在“遵循历史与文化”“与城市景观协调”和“体现人本主义”^{[14] (P35-36)}等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原则的指引下，各个城市正对

国内文化惠民工程中配套的各类城市公共设施积极有序地开展“更新与提升”设计。作为我国沿海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始终走在现代化城市建设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前列。为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上海提出全面加强城市文化的全球认知符号建设，率先在全国基本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全市布局网格化覆盖的“小而美”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并为此展开了一系列探索。因此，我们可以结合上海的实际案例，具体分析城市文化基因与公共设施的内在关系及城市文化基因应用于公共设施设计的有效路径。

（一）城市文化基因与公共设施的关系：文化引领与设计承载

在城市文化品牌塑造的视域下，城市文化基因于宏观层面引领公共设施文化内涵精神，于中观层面规范实体设施的文化性建设行为，于微观层面影响公共设施文化性设计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

公共设施是城市文化基因价值化的知觉体现，并作为城市宏观政策指导下营建的公共产品，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不断地更新完善。除具备基本的服务功能外，它还兼具城市文化传承的历史性和时代性。优秀的公共设施设计能够汲取城市文化基因中具有“识别力”的设计符号，以文化性设计传承城市文化。系统化展开的公共设施文化性建设行为是展示城市文化基因特色与魅力的有效宣传手段，精炼后的公共设施城市文化内涵则是强化城市文化基因、提升城市文化品牌识别力的良好着力点。

城市主体文化基因和混合基因是顶层设计中引领城市公共设施在多元文化浸染中仍彰显独特的“文化品牌”精神的关键。在《上海市“十四五”时期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规划》和《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深化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中，上海市政府明确提出要全力推进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等三大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在以上海城市文化基因为抓手实施的基础公共设施文化性建设工程中，中共一大会址作为“党的诞生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上海重点打造的弘扬红色文化基因的阵地。从强化、维护城市文化基因的角度出发，中共一大会址周遭的各项公共设施也与遗址一道进行了同步文化性升级，新的公共设施在设计中运用了如石库门纹案式样、青红砖交错配色和红色宣传标语等文化元素，在确保功能完备之余，兼顾设施形式风格的文化性。在江南文化基因和海派文化基因的带动下，上海苏州河黄浦段滨水区设施也被修葺并重新服务于“有内容的、有记忆的、有活力的”海派风情博览带。位于海派风情博览带沿岸区域内的公共基础设施在文化性更新设计中融入了“母亲河”建筑文化场景以及“上海”“SHANGHAI”中英文字样。这些焕然一新的公共设施依托上海城市文化基因，传承与发扬红色、海派和江南文化，在实际建设改造中设施与空间景观紧密融合，展示上海城市文化特色与魅力，经由市民体验，于街道中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是上海“开放、创新、包容”城市品格提升的强有力的支撑。

（二）城市文化基因与旧城公共设施设计的融合：功能转化与情感迁移

公共设施是城市文化基因的有形载体，其文化性更新设计与一般工业产品的迭代设计存在较大差异。在现代设计语境下，在公共设施的更新和提升过程中进行城市文化基因的融合和具有文化特性的符号语意与设计理念的植入，可考虑运用设计形态学的理论及方法，从外延功能语意转化和内涵情感语意迁移两个方面着手。外延功能语意转化主要包括对造型、色彩、图案、材质和结构等外在表象的文化性建构。内涵情感语意迁移则主要是指在设计过程中运用象征性语意或情感语意进行情感体验设计。

以曾经遍布上海城市街头的公共服务标志性设施——红色公用电话亭的文化性更新设计为例。在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等三大城市文化品牌的引领下，徐汇区新设立的“红色文化亭”和南翔老街试点运营的“新话亭”，用行动践行着上海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发展理念。新亭不仅继承、发展了原亭的历史功能，还在更新、迭代功能的同时，讲述“永不消逝的电波”故事，呼应了原亭作为普罗大众联络情感的物质载体的功能，有着凝心聚力的重要功用。

就外延功能语意转化而言，经文化性更新设计后的“有故事的红色电话亭”，亭体造型以近现代海派地标建筑“和平饭店”为原型，在吸收、融合传统江南“花轿”结构的基础上，结合了红旗、火焰、“石库门”等文化符号。由公用电话亭变身“红

色文化亭”，它们以不同时期红色故事图案宣传、讲述着上海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城市不断焕发的生命力。

就内涵情感语意迁移而言，在对公共设施进行文化性更新优化时，考虑到旧城公共设施是城市居民集体记忆的重要物质载体，经历过城市快速发展与公共服务变迁的城市居民对上海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有着深刻的印象。因此，在进行内涵情感语意迁移的过程中，可运用知觉设计、通感设计和叙事设计等设计方法激发市民的情感共鸣，通过建立公共设施的外在物质文化基因符号与公众愉悦的体验记忆之间的呼应，引发市民群体对新亭的情感反思，从而达到提升市民归属感、文化凝聚力和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最终目的。基于公众对上海公用电话亭历史文化的情感寄托，“红色文化亭”和“新话亭”均沿用了上海老式电话座机的造型表现形式，在具体接听交互方式上保留了原有电话听筒的造型。从使用习惯着手，促使市民由“提起电话听筒”的生理本能动作产生联想或主观移情体验，刺激并唤醒用户的集体记忆，最终达到上海城市文化基因的正向传递和延续。

五、旧城公共设施文化性更新的价值与意义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精神，在我国新时代城市建设进程中，用“以人为本”理念对城市公共设施尤其是旧城公共设施进行更新改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就城市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而言，在强调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时代背景和国家战略下，将文化性更新这一理念落实到旧城公共设施更新中是必要的。城市各个单元模块对城市文化基因的记忆、表达与再生是城市文化基因不断丰富发展的基础。进一步更新与完善特色突出、内涵丰富、文化感知识别度高的公共服务设施，对于传承与发展城市文化、提升城市居民文化自信、打造本土城市文化品牌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以公共设施的文化性设计统领城市意象，提升城市文化传承能力

在运用城市文化基因元素进行公共设施的更新设计时，既要运用差异化的表达手段，打造地区特有的城市综合意象，还要在设计理念中重视文化基因的共性。立足地域文化特色，确保设施、建筑、环境空间以及地域城市文化风貌协调统一，力求将文化基因的精神内涵以可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为现代市民生活提供持续的文化价值及审美坐标。

公共设施的文化性设计与城市文化的内涵丰富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在公共设施文化性设计中传承城市文化基因，在多元化的城市文化框架下构筑系统性的文化秩序，是城市文化内涵丰富发展的基本条件。提炼并挖掘城市文化基因，探索地域文化传承的优化路径，既有利于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文化内涵与品位、打造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品牌，也有利于提高公共设施的附加值，增加公共设施的文化气质。

（二）以旧城公共设施文化性更新助力宜居城市建设，提升市民归属感和幸福感

就打造幸福人文城市、强化市民归属感的现代城市建设目标而言，完备的城市公共设施必不可少。旧城公共设施更需要从功能、艺术和社会等多个层次进行设计考量，不断优化更新。

功能层面，强调人性化的公共设施更新设计，注重市民的实际使用需求。如：在规划设计中以科学技术为手段，延续原有的应急通讯功能，围绕“最后一公里”问题，配套完善其他各类生活服务功能。尝试提供移动设备快速充电、加设快递存储柜等，使城市居民生活更便利，体现城市人文关怀。

艺术层面，强调兼具实用性与美观性。对于城市街头公共设施的艺术性追求，不仅有利于全体市民文化、审美情趣的提升，还有助于营造更加开放共享的人际交往空间，通过触发非正式的文化活动与行为提升城市空间的可识别性与人文品质，最终提高城市公共空间活力。

社会层面,强调公共设施的社会嵌入。如:发挥公共设施的地理位置和布点规模优势,在应对城市突发公共事件时,通过在设施内增设临时医疗卫生检查点、放置应急救助物资等,紧密配合政府职能部门展开社会救助和卫生防疫等工作。

(三) 以公共设施构建城市街道空间子系统的内在文化联系,提升城市文化品牌辨识度

对以旧城公共设施为代表的城市公共设施进行较为整体的文化性更新优化,可将文化资源有机地串联起来,通过合理规划和系统设计实现城市面貌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如在造型、色彩、图案、风格等设施设计构成要素中,深度融合城市文化主体基因,适当地引入文化附着基因、文化混合基因和文化良性变异基因,使城市各区域街道中的公共设施总体呈现出较为统一的文化内涵。最终通过城市公共设施的直观表象与城市文化基因的相互交织,以公共设施为纽带将城市街道空间内的其他子系统紧密相连并相互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公共设施文化传承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决定了城市特色文化基因转型发展的成功与否。特别是在历史性标志地段,那些只关注地标性建筑单体的文化保护与建设,缺乏整体考虑的更新设计,仍有可能带来城市文化特色语境与活力的缺失。

参考文献:

- [1]范周. 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J]. 前线, 2017, (11).
- [2]张旭,王峰. 城市公共设施交互设计研究[J]. 包装工程, 2010, (10).
- [3]施舟人. 中国文化基因库[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4](英)R. 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M]. 卢允中, 张岱云,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1.
- [5]冯思豫. 文化基因视角下历史文化街区的街道家具构建研究[D]. 桂林: 桂林理工大学, 2020.
- [6]钱珏,臧勇. 设计中的文化基因[J]. 艺术与设计(理论), 2012, (9).
- [7]姚瑶,胡慧. 文化基因视角下导视系统设计研究——以独山革命旧址群为例[J]. 中国包装, 2020, (9).
- [8]苟秉宸,于辉,李振方,陈丽伶,王伟伟. 半坡彩陶文化基因提取与设计应用研究[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4).
- [9]方新,荣金金. 转译与物化:文化基因视域下的地域性产品设计[J].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 2020, (2).
- [10]吴良镛. 北京宪章[J]. 时代建筑, 1999, (3).
- [11]霍艳虹,曹磊,杨冬冬. 京杭大运河“文化基因”的提取与传承路径理论探析[J]. 建筑与文化, 2017, (2).
- [12]李冉. 现代图景与都市大众: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市民话剧[J]. 江西社会科学, 2020, (8).
- [13]陈虹颖. “互联网+红色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研究[D]. 重庆: 重庆工商大学, 2018.

[14] (美) 凯文·林奇. 城市意象[M]. 方益萍, 何晓军,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